

论李达的三部著作的历史地位

朱传荣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荣(1928-),男,山东滕州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摘要]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分别代表了我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受到了毛泽东和理论界的赞誉和肯定。这三部论著写作的目的、开创性的研究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治疗学风,至今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不朽榜样。

[关键词] 李达;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 B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745-05

2000年10月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汉大学老校长李达同志诞辰110周年。笔者年轻时代有幸直接聆听老校长的三次重要谈话^①,其内容、精神和情感,至今还激励着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和积极研究,对我40年来的教学与科研的成效,师德与学风的修养,都起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为此谨撰小文,以表达对这位毕生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前辈的敬仰与悼念。

李达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理论家、教育家、著作家和宣传家。他毕生的根本追求和崇高品格,就是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是一位终生如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开拓研究者,不论在任何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始终是立场坚定、无所畏惧、孜孜不倦地研究、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为满足客观实际发展的要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阐释、传播和运用,都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理论研究的领先水平,并受到学术界和革命者的充分肯定和赞誉。对此,谨就李达早年、中年和晚年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略作说明。

李达毕生进行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二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1920年和1921年,李达先后在《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就是有力的说明。因此,侯外庐先生称他“是一位普罗米修斯的播火者”。1922年秋,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赴湖南讲学,并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当时,李达以忘我的精神,孜孜不倦地研究、翻译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满足革命实践的需要。就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看,由于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不足,多数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浅即投入革命实践活动,就会有发生盲目行动的危险。此时,陈独秀在他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又号召青年同志,“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实践。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恰恰是革命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从主观上说,李达同陈独秀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的分歧中,也存在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的原则的分歧。李达主张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研究,陈独秀则相反。对此,李达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扣上研究系的头衔”^[1](第 10 页)。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它是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著作,是李达早年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代表作,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先水平的著作。该著于 1926 年初版、1928 年修订版,到 1933 年共印行 14 版,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因而反动当局曾以“著名共首,曾充当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

李达撰写这部著作目的,就是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提供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武器。同时,在这部著作中,他还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社会学。该著序言的最后一段话就鲜明地表达了写作这部著作目的。他说:“洞察现代社会学之趋势,实已由唯物论而进至唯心论,盖采取所谓社会心理学之方向者也。反因为果,倒果为因,推其极致,殆将愈使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也。予为此惧,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怨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2](第 237 页)。

该著最主要的突出特点是,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机械论,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对社会的结构、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具体阐明。李达认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变动。他写道:“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2](第 244 页)。当时,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上层建筑可直接影响或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彻底辩证法的新思想。他说:“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而造

成,已如上述。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2](第 249 页)。《现代社会学》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还全面地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政党和个别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其中他特别强调“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2](第 282 页)。此外,《现代社会学》中还提出了富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新论断:即社会系统协调发展论。对此,该著在第三章中以一节的篇幅作了阐述。其中写道:“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合体。社会是人类的系统,……社会之中有三个要素,即物、人与观念。社会的系统中,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是互相调和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换言之,这三个系统若不是互相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2](第 503—504 页)。

其次,《现代社会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密切结合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阐述和运用。因为,那时的李达就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行到实际的时期了”^[2](第 202 页)。因此,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特点的分析,得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国际半殖民地”的性质。所以,在论著的后半部分,对“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革命”、“国际的社会运动”、“完整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问题,列专章分别进行了深刻研究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具体地论述了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以及民族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作了有力的论证。此外,《现代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我们说《现代社会学》代表了那个历史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和运用的最高水平,是有充分根据的。

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的 10 年间,是国民党进行白色恐怖、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到建国前夕,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在形式上虽有所收敛,但反革命的文化专制并没有放松。李达中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就是在这种险恶形势下进行的。他无所畏惧,不避艰险,

与地下党组织保持直接联系,转战上海、泰山与北平等处,忘我地勤奋研究、翻译、宣传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20年的期间,他开创性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货币学、法学、社会学等广大领域,硕果累累,是他学术生涯中著述最丰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代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就是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不论就其理论上的开拓性,还是就其对革命实际的指导意义而言,它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界碑。该著出版后,李达即寄赠毛泽东,毛泽东不仅读了10遍,还作了详细眉批,并推荐给延安理论界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研读,称赞这部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赞扬李达是“真正的人”。这部论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社会学大纲》之所以产生这样广泛的深刻影响,就在于李达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自觉地为满足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给革命者理论武器。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历史观武装革命战士。该著第一版的醒目题字就是“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到1939年第4版时,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革命形势转入高潮之际,李达在这版序言中,将他著述的目的,写得更为具体和鲜明:“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之前”^[3](第7页)。

《社会学大纲》的特色和领先水平之处:首先是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把自然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价值观统一起来,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该著认为,30年代的苏联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大块”,把历史唯物论看做是辩证唯物论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是机械的片面性观点。书中明确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联。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3](第283页)。有的《社会学大纲》研究者认为,李达在书中也有“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领域”的话语,与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观点没有区别。这种看法是

不全面的,没有完整的引证李达的原话,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理解李达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的思想实质。李达论述这个问题的重要理论前提,就是“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应用,他认为,“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3](第282页)。这里,他强调的是运用当作世界观看的辩证法。所以,他写道:“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3](第283页)。所谓“只有彻底的”就是强调辩证法在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即作为“世界观看”的意义。这和恩格斯论述唯物史观产生的思想是一致的。恩格斯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4](第691—692页)。所以,李达在书中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论者,指出:“他们的唯物论,只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不知道把唯物论扩张到历史领域,反而在历史领域中变成观念论的俘虏”^[3](第283页)。因为他们是形而上学者,不懂辩证法,所以,就不能把唯物论彻底贯彻到社会领域中,他们“根本不知道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也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关联和统一”^[3](第283页)。由此可见,李达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论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者,是与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两大块”论是有区别的。

其次,《社会学大纲》凸现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这从该著第一篇诸章的标题上就鲜明地显示出来。第一章“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是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发展以及重大意义。第二章“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任务和一般特征,以及它在说明哲学诸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和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形式等问题。第四章“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主要是论述了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同一问题;具体地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人类认识反映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体、相对与绝对等问题;还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等问

题,这均是当时领先水平的唯物辩证法研究。

再次,在该著全书中始终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李达认为,马克思把实践纳入唯物论,不仅使认识论变得更为科学了,而且使整个“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3](第 60 页),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的基础。他说:“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3](第 56 页)。李达在阐述“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之统一”时,批判割裂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错误观点,强调二者“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的。但是,他也明确地指出:“社会的实践,比较社会的理论,占居优位”。其理由“可以分为四点:第一,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的出发点;第二,社会的实践是一切社会的认识之规律,是社会的理论的真理之规准;第三,社会的实践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两者间所必要的联结的规定者;第四,社会的实践不但有普遍性价值,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3](第 305 页)。该著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历史形态、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论述,就是以社会生产实践为逻辑起点的。把实践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研究,这在当时的理论著述中,是非常罕见的,也是具有领先水平的极为深刻的研究。由此可见,《社会学大纲》在当时产生那么重大的广泛影响,就在于它满足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讲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5](第 11 页)。

三

新中国建立后,李达把研究和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他的理论活动进入了新的时期,其成就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他在 50 年代初期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不仅全面、准确地解释了毛泽东的基本观点,论证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还提出和阐明了正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这两部解解说对建国后全党的理论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60 年代受毛泽东的委托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他晚年最后一部名著。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项重要理论建设,是国内哲学界极为关注的理论研究,对于科学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反对教条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概括地说,这部著作的基本特点是:首先,它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下,充分吸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其中不仅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且还概括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现实经验。同时,书中还深刻阐述和注意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对一些错误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对于人们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这部著作以较大的篇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发展的积极成果和批判总结,历史地和逻辑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阶段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鲜明地指出了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防止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盲目崇拜的原则问题。再次,该著概括了新的科学成果,在书的第三篇中,比较系统地集中概括了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并借以对重要哲学原理作了深刻阐述,增添了新内容,丰富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该著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认识论的全部理论,既深刻体现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原理,又展现了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的理论期望,充分吸取了《实践论》的成果,同时保留了和发展了《社会学大纲》的原有特色和成就,使这部著作反映了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

综上所述表明,李达的理论活动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他的哲学研究也在日新月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研究成就力求达到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分别代表了我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李达同志不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和先驱。今天我们缅怀李达同志坚持和发展主义的光辉业绩,首先,要学习和继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主义科学理想的立场和精神。纵观李达一生的理论活动,绝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白色恐怖和反革命迫害的环境中,到了晚年为坚持真理而遭迫害致死。李达之所以具有百折不挠、临危不惧、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就在于他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理论信仰和科学理想决定着人们的前进方向和精神状态,而坚定的理论信仰和科学理想是以深厚的理论素养为基础的。因为,理论既是管方向的,又是行动的指南。其次,要学习和继承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学风。李达的理论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达到当时理论的最高水平,就在于他能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

和新的的发展,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精神。因此,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就必须认真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理论运用,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离开本国实践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问题”,既是当代中国人民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民族性的问题,又是关系着人类命运的世界性的问题。个别的民族性问题与共同的世界性问题是一致的。那种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实践问题,片面强调关注研究所谓全人类的世界性问题,主张远离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甚至明确提出按照现代西方学者研究后现代化社会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用新自由主义思想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评判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这是十分有害的思想,也是极端错误的观点。我们反对那种只强调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忽视或反对思想文化导向的一元化的错误主张。其实,现代西方学者

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其深刻而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的,既不能采取简单的赞同态度,更不能盲从。应该采取“以我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意识的态度,善于吸取现代西方先进哲学的最新成果,批判其陈旧的错误思想,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

注 释:

- ① 参见拙文:《谆谆教诲 没齿难忘——忆李达校长的几次谈话》,载《珞珈哲学论坛》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79—83页。
-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

[参 考 文 献]

- [1] 李达. 中国所需要的革命[J]. 现代中国,1928,2(1).
- [2] 李达. 李达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李达. 李达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4] [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德]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严 真)

LI Da's Three Works: Historical Position

ZHU Chuan-q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Chuan-qi (1928-),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LI Da's three works *Modern Sociology*, *Outlines of Sociology* and *Outline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ummits of Marxist studies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First Revolution, that from the Second Revolution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at from the Liberation War to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works have their straight purposes, are full of original spirit, and are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y were appreciated and praised by Mao Tsetung and many other scholars, and are directive of our present study of Marxism.

Key words: LI Da; theoretical belief; Marxist studies;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